



第三章 赤子之心

魂梦不忘改造中国 ——容闳，近代华侨学者之翹楚

“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这段话是美国著名牧师特韦契耳对他的好友容闳的评价。当时容闳为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的副公使、兼留美学生监督，正在努力贯彻由他倡议的中国政府第一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由他带领和负责管理 120 名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准备学成后归国为“改革和复兴中国”^{*}，

* 本篇引文均选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实现他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方案而努力奋斗。

一、“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1828年（清道光八年）11月生于



容 闳

广东香山县南屏区（澳门附近，现属珠海市）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少年时期在英国传教士所办的一所马礼逊学校念书，由于成绩优异，1847年在教会的资助下，随美国教师布朗远渡重洋，进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森学校学习。1850年他考进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在学习期间，容闳依靠美国一些社会团体的资助，以后又主要通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完成了大学学业。1854年，

他获得文学士学位，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

容闳生活的年代，中国正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容闳也是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较早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张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一名终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和民主而努力奋斗的战士。他是留学外国取得大学学位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我国由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热情倡导者和主持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学者和教育家。正因为他热爱祖国、为救中国而积极斗争，最后从一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到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逃亡美国而终老

异邦。

容闳是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影响而纯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培植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保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他不加选择和批判地接受了所谓的西方文明,却没有一点奴颜媚骨。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在美国学习期间,立誓“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而为之”。当他即将在孟森学校毕业时,资助他的教会要以他当传教士为条件,再送他上大学。容闳虽是个教徒,但他宁可辍学也不填“志愿书”。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更念及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把美国作为模特儿,要把中国改造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而奋斗终身。

1852年,容闳加入了美国籍,他以美国为“第二祖国”。两年后,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因成绩优异,很多诱人的职业由他挑选,他不受诱惑,毅然回国,以实现“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而为之”的志愿。

1855年春,容闳27岁时,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多次被迫更换职业。开始,他在广州的美国驻华公使馆任书记,“欲借伯驾(美驻华公使)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但当发现实现不了志愿时即自行辞职,到香港高等审判厅任翻译,又到上海海关任翻译。当时的月薪是很高的,每月白银75两。但他见海关中贿赂公行,商船与海关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乃深恶其卑鄙,不屑为伍”而自动辞职。英籍税务司李泰国以加薪至200两对他收买笼络,

他毫不动心,毅然辞去。他为此发表感慨:“噫!彼固以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重,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者邪!”

离开海关后,容闳在上海英商一公司“暂借枝栖”。他在来往于苏杭、绍兴、皖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购茶叶、生丝时借机进行实地调查。此时,太平天国已建都天京,他因“深恶满人之无状”,对太平天国抱很大希望。1860年,他特地到天京,拜访了当时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七项改革方案,得到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洪仁玕的重视和赞赏,许以封爵。但天京之行也使容闳看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于是,他辞爵离京。

1860年天京之行归来,容闳感到要实现改造中国的理想,“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他认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于是,他在继续为外国洋行采购茶叶之后,又在九江自营商业,三年中虽积聚了一定财富,但丝毫无裨于实现他“改造中国”的抱负。

从回国到反复择业,容闳看不见“实现他的计划的希望”。他把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期”。为“谋全中国之幸福”,他要寻找机会,“谋食亦谋道”,以“达予维新中国之目的”。

二、办洋务、办教育都是为了改造中国

19世纪60年代初期,清王朝在镇压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以曾国藩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他们与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接触后提出了“自强求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他们要创办军事工业、聘请洋员、购

买外国机器,建设制造军火的制造局。此时,容闳经赵烈文等人介绍,到了曾国藩那里。从1863年起到80年代初,他花了近20年时间帮助洋务派办理洋务,为创办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而多次远渡重洋,跋涉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容闳之所以参加洋务运动并为之效劳,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他念念不忘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为洋务派出谋献策、不辞辛劳往返奔波,想以此作“进身之阶”,以实现他培养资本主义人材的教育计划。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所指出:容闳的目的是在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洋务派的目的则在镇压革命,他们走的是殖民地的道路。

1867年后,容闳以自己与洋务派的特殊关系,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他的教育计划:分期分批选拔和遣送少年到美国留学15年,名额暂定120名,每年一期30人,按年分送出洋,15年后,仍按年依次分送回国。容闳期望:“使予之教育计画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将教育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就能大大地变样——由落后变成先进。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容闳的教育计划,1872年成立了一个“幼童出洋肄业局”,任命陈兰彬、容闳为常设美国“洋局”的正、副委员。1872年8月,第一批30名学生正式成行,到1875年秋第四期30名少年赴美后,120名留学生都陆续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就读。

1875年12月,由于洋务派的推荐,清政府又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正、副公使,这是清政府派驻这些国家的第一任公使。但容闳对做官不感兴趣,他把自己的教育计划看作“最大事业”,是“报国之唯一政策”,他要求当

时主政的李鸿章转请清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清政府答应他“以副公使而兼监督之任”，继续负责管理留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

但是，尽管容闳尽毕生精力，图“教育救国”，他的这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在他兼任留学生监督后不久，清政府又任命了另一叫吴嘉善的封建守旧派人物为留学生监督。这个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一起，联合封建守旧势力，指责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于是，1881年6月8日（清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清政府下令撤销“幼童出洋肄业局”，全部调回留学人员。这时，第一期学生赴美才9年，离计划尚差6年。在120名留学生中，除中途因故撤回及在美病故26名外，只有詹天佑、欧阳赓刚由耶鲁大学毕业。容闳“教育救国”的计划又破产了。

三、从维新走向革命

自1880年至1886年，是容闳自己认为的“最不幸时期”，首先是“毕生志愿（指教育计划），横被摧残”；其次是终生伴侣，他的妻子克洛因病去世。当时他回到美国，要抚养两个未成年（一为7岁、一为9岁）的儿子。当他得知中法战争爆发及其后外国侵略者不断入侵、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消息时，忧心如焚。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他终于忍不住了，一连向当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老同事蔡锡勇写了两封信，提出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置铁甲舰，雇佣外兵5000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等建议。张之洞对此颇表赞同，电令容去筹商借款事项。此事一切就绪，但因遭李鸿章反对未成。1895年容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而回国，此时虽已66岁一老翁，但爱国之心愈烈。

从1896年到1898年,容闳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两次建议:一是参仿美国银行章程,设立国家银行;二是与美商合作,经办全国各地铁路。在户部尚书翁同龢支持下,他着手办国家银行,但终未办成。至于经办铁路,清政府根本没有同意。

容闳从文化而教育,从教育而经济,“改造中国”的愿望始终未得实现。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已逐步走向高潮,这使容闳积极起来。他完全支持变法维新,在京的寓所“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不计个人安危函请美国驻华公使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他自己逃亡上海,“托迹于租界中”。

1900年6月,维新派湖南地区领袖人物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军”和“自立会”,倡立“中国国会”,容闳被公推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他们提出“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部署自立军,分布七军,约期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同时发难,要光绪帝重新执政。不久,“自立军”“讨贼勤王”计划泄露,唐才常被张之洞捕杀,容闳离沪赴日,后又转至香港。在赴日途中,容闳巧遇孙中山,彼此相见恨晚。容认为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而孙中山也认为容闳是“声望素著,富新思想”,热心于改革中国的老前辈。

由于容闳当时的声望及其对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支持,清政府对他严加通缉。1902年他回到美国旧金山旧居。一方面,他撰写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另一方面仍关心祖国的命运,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谢纘泰保持密切联系。康、梁曾去美国拜访过他。1908年后,他更多的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9年,容闳与美国人

布思、荷马李等拟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准备募集巨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容闳兴奋至极，立即写信向这次斗争的领导者表示祝贺，在信中忠告不要为阴谋家袁世凯之流所欺骗。他指出：“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他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①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特地向容闳发出邀请信，殷切地希望他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容闳这时已病重。1912年4月21日，这位可敬的爱国主义战士终于与世永别了，终年84岁。

容闳在他一生的80余年生涯里，有40个春秋在美国度过，他与美国的关系很深，然而他魂梦不忘改造中国，至死心还向着中国。他深受欧美资产阶级西方文明之熏陶，然而却始终不忘东方这个古老而贫穷的中国，务必要使之进步发达。为此，他3次经印度洋远渡大西洋，8次横贯太平洋，迢迢几十万里，到了晚年，又被迫两次逃亡，最后被通缉流落外邦。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是那么的强烈和持久，堪称爱国华侨学者之翘楚。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4～325页。